

普惠金融竞争下的中小银行风险重构

——基于大型银行业务下沉的实证发现

蔡庆丰，舒少文，邹静娴，黄蕾

[摘要] 防范和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2017年11部门共同发文要求大型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发力普惠金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那么，这种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是否会影响地方性中小银行的经营与风险呢？本文以2010—2021年地方性中小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推升中小银行风险，引致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分化，表现为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提升更为明显。影响机制显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引致中小银行存贷双重承压、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进而抬升其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银行竞争程度较高和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在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加速了区域中小银行合并，有助于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地区实体经济的能力，可以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此外，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加速其基层网点扩张以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普惠客群。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政策推动下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于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还为防范和化解中小银行异质性风险和地区金融风险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 普惠金融；中小银行；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 F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25)02-0099-19

一、引言

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三大风险是新一轮经济金融改革的重点，也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目前，关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和讨论，而作为“三大风险”之一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及处置的相关研究有待深入。地方性中小银行是中小金融机构的主体，普遍存在规模小、治理不完善、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容易引发和传溢风险，是中

[收稿日期] 2024-07-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批准号23&ZD079)。

[作者简介] 蔡庆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舒少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邹静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黄蕾，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邹静娴，电子邮箱：zou_jingxian@163.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与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国金融体系中重要却薄弱的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中国高风险银行数量合计346家,其中地方性中小银行数量为330家,占比超过95%;而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5%和3.22%,高于整个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1.71%。但是,地方性中小银行深耕本地,在服务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客群上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2年末地方性中小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合计为10.34万亿元,约占全国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的1/3。^①为了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以更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7年5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11部门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从政策层面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截至2022年末,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合计11.74万亿元,在服务小微企业和新市民等普惠金融客群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但这种由国家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在有力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发力和延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地区银行竞争格局和中小银行的经营及风险。

根据银行优势假说,中小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上具备比较优势(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在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下,大型银行往往更愿意放款给抵押物相对充足的大型企业,或者具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国有企业,不太愿意涉入规模较小、信用风险和经营成本都较高但风险调整后收益较低的小微企业贷款。这种基于银行信贷差异与偏好形成的分层金融供给体系,使不同银行之间的竞争处于相对平衡状态。2017年监管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下沉以及相应的普惠金融业务监督考核要求,促使大型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加速普惠金融服务下沉。从统计数据看,国有五大银行的普惠金融余额从2017年的1.43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7.36万亿元,增长了5倍左右,约占2022年全国银行业普惠金融余额的1/4。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导致地方性中小银行面临更激烈的业务竞争:一方面,具有声誉优势和资金成本优势的大型银行能够以更优惠的利率为小微企业、“三农”企业提供普惠贷款,这会分流中小银行部分优质的普惠客群。为了填补优质客群流失所带来的资产配置缺口,中小银行只能进一步下沉服务客群,放贷给那些原来并不符合普惠金融业务的更高风险客群,这使得中小银行的资产端出现整体劣化趋势。另一方面,中小银行的普惠贷款利率也会受大型银行优惠普惠利率的影响而难以提高,导致利率无法有效覆盖风险。而城商行由于在网点布局和客群定位上与大型银行相对更为相近,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现有关于中小银行风险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款保险费率(刘妍等,2022)、银行扩张(郑宁等,2023)、存款保险制度(高昊宇等,2023)、竞争环境(田雅群和何广文,2022)和互联网金融(Allen et al., 2011; Cornett et al., 2022)。上述文献可以归纳为制度变化、银行自身经营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其中,田雅群和何广文(2022)从新兴金融(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竞争的视角分析了互联网金融进军农村对农商行风险的影响,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会推高农商行的付息成本、压缩其多元化收入空间,进而推升其风险。换言之,该文献主要聚焦新竞争主体出现(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竞争效应对农商行的影响。王修华和刘锦华(2023)从竞争视角分析了

^① 本文关于城商行和农商行2022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数据分别来自中国银行业协会城商行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23)》和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中小银行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3)》。

^② 据《2022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23.60万亿元,六大银行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合计8.54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了31.99%,在贡献普惠金融力量方面仍发挥着“头雁”作用。

政策因素影响下银行竞争对农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发现大型银行下沉会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集中度和贷款规模,同时抢占农商行的优质客户,聚焦于分析政策影响下优势竞争主体业务下沉对农村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结构的影响。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更多聚焦银行或大型银行的经营行为及其风险,较少聚焦中小银行风险相关的议题。部分聚焦中小银行行为的相关研究局限于研究新兴金融市场发展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或单纯分析竞争优势主体行为变动对中小银行存贷业务的影响,忽视了监管政策带来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异质性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为了有效增加普惠金融服务供给,缓解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等领域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监管政策要求大型银行率先发力普惠金融业务。大型银行在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其市场行为可能对中小银行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因此,有效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是本文的逻辑起点。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10—2021年中国地方性中小银行样本,以2017年11部门发文要求大型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为政策时点,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影响,并探究不同性质中小银行风险的异质性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推升中小银行风险,造成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分化,表现为城商行的风险提升更为明显,该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替代性解释和其他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引致中小银行存贷双重承压、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进而造成其风险上升,且上述效应在目标客群更为接近的城商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推动作用在银行竞争更为激烈和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在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加速了区域中小银行合并,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地区实体经济的能力,还可以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此外,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加速了其基层网点扩张以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普惠客群。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政策推动下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影响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的内在逻辑,还为防范和化解个体银行风险和地区风险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启示。

与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可能有如下边际贡献:①不同于现有研究多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探讨银行行为(郭丽虹和朱柯达,2021),本文从普惠金融政策引发的银行竞争变化角度出发,研究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影响,丰富了中小银行风险影响的相关研究。②深入分析了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导致银行竞争格局演变,进而影响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的内在机制,为中小银行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现有研究主要强调银行利润下滑或边际定价能力下降等机制(Jiang et al., 2023),而本文从中小银行存贷两端、影子银行业务和资产端成本等渠道展开分析,有助于为当前推动中小银行风险治理提供借鉴思路。③探讨了政策推动下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并将其扩展至地区性风险处置的研究框架,补充了现有关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处置及其对于实体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

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研究认为,依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中小银行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而言,小微企业、“三农”用户等具有普惠性质的客群是其主要服务对象。近年来,

为了弥补金融服务短板,增加有效金融供给,缓解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等领域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家政策要求大型银行率先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大型银行依靠其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数字化优势得以快速下沉(王曙光,2022),叠加其技术转型优势(王鹏,2024),可能会分流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优质客群,导致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从而推升其破产风险。在中小银行内部,城商行因其主要客群与大型银行存在较大范围重叠,受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冲击更大,表现为更明显的风险上升。相比而言,农商行作为县域金融的主力军,其经营网点更多布局在县城以及乡镇,在服务本地和服务“三农”上具备优势,因而能够抵御来自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冲击。由此,本文认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引发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重构,且对客群结构更为接近的城商行的影响更大。这种风险推升可能有如下影响渠道:

(1)存贷双重承压。国家政策要求下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会加速大型银行推进普惠金融业务的进度。在数字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大型银行能够突破物理网点的限制,更加精准地触达普惠客群,并与地方性中小银行形成激烈的业务竞争。从存贷两端总量看,大型银行在声誉、便捷性和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上具有优势(李双建和田国强,2020;罗荣华等,2020),吸引储户的能力更强,因此可能分流中小银行储户资源。大型银行有更加全面的综合服务能力,叠加数字赋能金融机构转型,使得这类银行在服务长尾客群和小微企业方面也具有优势(Berger and Udell, 2006)。从贷款结构看,大型银行在贷款端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且能够以更低利率服务客群,因而可能会分流地方性中小银行资产端的优质客群,导致其资产劣化。相比农商行,城商行与大型银行在主要客群上存在较大程度的交叠,且其普惠金融业务服务重心下沉不够,导致自身的优质客户容易被大型银行分流,推升其风险。此外,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导致原有的区域银行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威胁会改变中小银行的经营行为。竞争加剧会迫使银行花费更多成本维护现有客户(Maudos and de Guevara, 2007),而获取新客户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无论是维护现有客户还是获取新客户,都会导致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上升,体现为利息支出攀升。对处于竞争相对弱势的地方性中小银行而言,吸引储户是保证其资产端投放并获取收益的基础。因此,中小银行会提高存款利率以吸引储户。负债端的高成本需要资产端的高收益来匹配,因而会进一步压缩其资产端的投放空间,这样必然会推升自身风险。在前述的分析中可以认为,城商行和大型银行的客户结构较为接近,经营业务的重叠度较高,且其普惠金融业务服务重心下沉度不够,难以与大型银行之间形成差异化的业务竞争。因此,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可能导致城商行在存贷两端承压更加明显,进而加剧其风险。

(2)影子银行业务扩张。现有的银行竞争理论大多认为,银行竞争加剧会促进影子银行业务扩张(张小茜等,2023;Huang et al., 2023)。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而言,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竞争效应会导致其经营恶化,即可能会导致中小银行传统存贷业务收缩,盈利能力下降。因此,地方性中小银行可能会扩张影子银行业务。具体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①相比中小商业银行,大型银行自身的信息透明度较高,且受到金融监管部门更严格的监管,因而可能会较少涉入影子银行业务。②相比传统业务,影子银行业务受到的监管约束相对更少,有更高的风险和收益。但是,中小银行自身的治理和经营存在固有问题,叠加影子银行业务总体透明度较低和业务链条较长等特征,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加速积累。相较而言,农商行自身经营高风险业务受到较大的限制,涉入影子银行业务的规模相对有限。而城商行自身的业务特点导致其受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冲击更加明显,更有可能涉入影子银行业务,进而推升其风险。因此,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可

能会导致中小银行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进而推升中小银行风险,且城商行受到的冲击会更加明显。综合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

H1: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引发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重构,且对客群结构更为接近的城商行影响更大。

H2: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导致地方性中小银行存贷双重承压、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进而推升中小银行风险,且对客群结构更为接近的城商行影响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中小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区间为2010—2021年,研究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区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使用的中小银行相关数据在通过公开数据库如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万得数据库(Wind)获取的基础之上,还从各中小银行公布的财务报告文本中人工查找并补充数据。其中,普惠性小微支行的数据通过Python软件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模块爬取相关的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再按照银行分支机构具体名称的关键词确定普惠性小微支行,^①最后手动识别、补充和确认。城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相关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该数据区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尽量剔除可能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年份;二是受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城市数据获取的时效性,本文样本截至2021年。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还对数据做如下处理:①仅保留城商行和农商行样本;②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观测值;③对主要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的数据处理和合并,本文共得到2924个银行一年度观测值。与以往研究中小银行的文献相比,本文的样本覆盖更广。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中小银行风险。本文主要研究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因而需要关注银行风险的测度。本文参照顾海峰和于家珺等(2019)的研究,采用能够综合反映银行风险的指标Z-score测度银行风险(*Risk*)。考虑到该指标具有的偏态特征,在后文的回归中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2)主要解释变量: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本文主要关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采用强度DID的识别策略进行研究。大型银行作为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主体,其在各城市的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也会影响政策实施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程度和选择。因此,如何有效设置合适的强度变量成为重点内容。本文考虑以政策前1年(2016年)地区大型银行的普惠性小微支行数量(单位:百家)来识别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政策带来的影响。政策实施前该地区大型银行设立的普惠性小微支行数量越多,则大型银行继续在该地区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边际效益会更低,因此,大型银行可能会更多在其普惠性小微支行设立较少的地区涉入:一方面,大型银行在竞争对手设立普惠性小微支行较少的地区更容易进入,因而

^① 银行设立小微支行的目的是服务中小微企业,这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领域。根据本文统计的数据显示,除了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会设立小微支行,国有五大银行和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会设立小微支行,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形式。因此,本文用小微支行数量表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可能会对地区的中小银行带来更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从普惠金融政策支持和考核看，大型银行在普惠性小微支行较少的地区拓展普惠金融业务更容易满足监管和考核要求。考虑到政策前1年地区大型银行普惠性小微支行设立数量是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下沉政策影响的反向指标，本文取其相反数作为强度变量(*Intensity*)。对于政策冲击的虚拟变量(*Post*)，若当前年份大于或等于2017年时，*Post*取值1；反之则取值0。由此，强度变量和政策冲击变量交乘(*Intensity*×*Post*)即为本文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参照以往的研究文献，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为：银行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拨贷比(*PLR*)、资本充足率(*CAR*)、利润增长率(*Prog*)、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PCR*)、经营波动性(*ROA_vol*)。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城市银行竞争度(*HHI_bank*)、城市产业结构(*Ind_struc*)、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GDP_g*)、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er_capia*)和城市人均工资水平(*Wage*)。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①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具体定义
被解释变量	中小银行风险	<i>lnRisk</i>	采用能够综合反映银行风险的指标Z-score测度；由于该指标具有偏态特征，在后文的回归中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解释变量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	<i>Intensity</i> × <i>Post</i>	<i>Intensity</i> 为强度变量，采用政策前1年(2016年)地区大型银行的普惠性小微支行数量的相反数度量； <i>Post</i> 为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当年份大于或等于2017年取值1；反之取值0
银行层面控制变量	银行规模	<i>Size</i>	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拨贷比	<i>PLR</i>	银行拨备/总贷款
	资本充足率	<i>CAR</i>	银行资本总额/加权风险资产
	利润增长率	<i>Prog</i>	本年度净利润和上年度净利润之差/上年净利润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i>PCR</i>	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良贷款
	经营波动性	<i>ROA_vol</i>	银行滚动3年的ROA标准差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城市银行竞争度	<i>HHI_bank</i>	城市银行分支机构占比的平方和
	城市产业结构	<i>Ind_struc</i>	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i>GDP_g</i>	当年和上年地区生产总值之差/上年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i>Per_capia</i>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城市人均工资水平	<i>Wage</i>	城市人均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

3. 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城市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强度双重差分回归模型：

^①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ln Risk_{i,j,t} = \alpha_0 + \beta_1 Intensity_{j,2016} \times Post_t + \gamma Controls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 Risk_{i,j,t}$,表示 j 地区 i 银行在第 t 年的风险情况。 $Intensity_{j,2016}$ 为强度变量; $Post_t$ 为政策发生的虚拟变量,若当前年份大于或等于 2017 年时, $Post$ 取值 1;反之则取值 0。 $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内容见表 1。此外,为了确保实证检验的稳健性,本文还控制了银行个体固定效应(φ_i)和时间固定效应(μ_t),以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动和时间层面不随个体变动因素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Intensity_{j,2016} \times Post_t$)的回归系数 β_1 及其显著性,如果回归系数 β_1 显著为正,则说明政策推动下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推升地区中小银行风险。

四、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2 汇报了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仅加入主要解释变量,第(3)、(4)列在前面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第(5)、(6)列则加入所有的控制变量;第(1)、(3)、(5)列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第(2)、(4)、(6)列则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加入银行个体固定效应。第(1)一(4)列的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Intensity \times Pos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加剧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从第(5)、(6)列的回归结果中依旧能够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证明了本文 H1 的论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没有显著异常。^①

表 2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

	(1)	(2)	(3)	(4)	(5)	(6)
	$\ln Risk$	$\ln Risk$	$\ln Risk$	$\ln Risk$	$\ln Risk$	$\ln Risk$
$Intensity \times Post$	1.6620** (0.6756)	1.0313** (0.4376)	0.4967*** (0.1735)	0.9012*** (0.2411)	0.5564*** (0.1656)	0.8485*** (0.2334)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924	2920	2924	2920	2924	2920
Adj. R ²	0.1003	0.2909	0.7631	0.7869	0.7659	0.7871

注:***、**、*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2. 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异质性效应^②

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导致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重构,推升

①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② 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中小银行风险。然而,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在经营特点和业务服务上存在的差异性,也会引致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影响的异质性。相比农商行,城商行和大型银行在客群结构上更相似,且在服务和网点布局上重合度更高,因而其受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冲击更加剧烈。农商行能够充分利用“本地优势”拓展普惠金融业务,正面避开来自大型银行的冲击,形成错位竞争,进而降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下沉可能对目标客群更为相似的城商行风险影响更大。为此,本文引入指示中小银行性质的虚拟变量(*Bank_nature*),若对应银行为城商行,*Bank_nature*取值1,若为农商行,则取值0。将其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推升作用更加明显。

3. 稳健性检验^①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是能够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均采用事件研究法做平行趋势检验,具体的做法是,引入多个时间虚拟变量和处理组虚拟变量交乘,并观察交乘项系数的显著程度。如果事前时间虚拟变量和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均不显著,即可认为政策冲击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性,通过平行趋势检验(Roth et al., 2023)。因此,本文对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 Risk_{i,j,t} = \alpha_0 + \sum_{m=-4}^{m=4} \beta_m Intensity_{j,2016} \times Post_t^m + \gamma Controls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其中, $Post_t^m$ 为以试点年份2017年为参照基准生成的相对年份的虚拟变量。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可能保证在事件前后的时间长度相对一致,本文在此处的平行趋势检验部分将事件发生4年之前的各期归并到第 $t-4$ 期。同时,本文以政策冲击前1年作为基期,因而其不进入回归。结果显示,在2017年政策冲击之前的年份中,时间虚拟变量和处理组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在政策冲击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中小银行风险具有事前一致趋势,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2)安慰剂检验。为了能够尽可能地避免不可观测因素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安慰剂检验做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的思路为:首先,将本文的实验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随机打乱,并将政策冲击时点也随机打乱;然后,对随机化处理后的样本进行1000次随机抽样回归,并提取回归系数。结果发现, $Intensity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值的核密度分布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绝大多数集中在0附近且不显著。同时,随机化政策冲击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回归系数均小于基准回归中的真实值。综合上述分析,基本可以排除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由随机化因素所引致的,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其他稳健性检验。前文利用多种检验方式对基准回归做稳健性检验,但是依旧可能会存在相关的因素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因此,本文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①采用政策前4年地区大型银行普惠性小微支行设立数量的平均值取相反数作为强度变量($Intensity1$)。这样尽可能避免某年随机事件造成的影响,进而能够让强度变量更具有代表性。②采用政策前1年地区大型银行设立的普惠性小微支行数量占地区普惠性小微支行数量的比重取相反数作为新的强度变量($Intensity2$)。这种处理能够从相对值的角度捕捉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下沉的影响强度,进而能够增强本文回归的稳健性。③加入更多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城市层面的其他因素如政府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财政支出(*Fiscal_ex*)、城市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和城市开放程度(*Openness*)的可能影响,^①本文将上述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④剔除直辖市样本。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发展和行政层级等方面的特殊性,本文剔除位于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的中小银行样本进行回归。^⑤考虑到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动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省份一时间高维固定效应。^⑥排除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从现有的研究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会导致银行自主存贷款定价权降低、利差收窄,进而可能会推升银行风险。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为了排除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影响,本文仅保留2018年及之前年份样本进行回归。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4)排除其他替代性解释。本文的结果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带来的干扰,因此,着重从金融监管强化、存贷比监管政策放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排除。

金融监管强化。政府政策可能会影响区域经济体的行为决策(蔡庆丰和陈熠辉,2023)。金融监管政策是国家金融审慎监管的重要体现,也是防范和化解个体银行风险和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然而,长期以来银行业的“野蛮生长”和增量扩张的模式叠加中小银行不完善的内部治理,也造成这类银行可能存在更加明显的“一管就死”现象。因此,地区金融监管强化可能导致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集中爆发,产生监管的风险效应。同时,金融监管强化可能规范对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监管,会更大程度促进其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结果可能是由金融监管强化带来的风险效应。为了能够排除这种可能的影响,本文引入金融监管强化的代理指标(*FR*)。具体而言,本文用各个城市银行违规处罚案件数测度,^②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

存贷比监管政策放松。存贷比反映的是银行总贷款和总存款之间的比例关系,存贷比过高会导致银行的库存现金和准备金缺乏,容易引发银行的风险。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国家于1995年将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超过75%的红线写入法律。进入新时代,为了适应新时期信贷资源配置和银行监管的需求,国家取消了对银行存贷比的限制,存贷比限制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效力逐渐下降。从现有的研究看,存贷比监管政策放松也可能会引发存款竞争和银行资产负债错配(Gennaioli et al., 2013; Meeks et al., 2017),推升中小银行风险。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解释,本文拟引入能够控制存贷比监管影响的变量(*LDR×Dum_2015*),^③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尤其对地方性中小银行经营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会恶化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对大多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可能会降低企业的贷款意愿,银行资产端的资金投放受限,经营绩效下降;另一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还会导致企业经营受限,导致企业偿债能力恶化,推升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的推升作用可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所引致。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解释,本文

① 政府财政支出(*Fiscal_ex*)采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城市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采用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城市开放程度(*Openness*)采用城市当年进出口总额之和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测度。

② 违规处罚力度能够反映银行监管强度,本文使用地区银行违规处罚案件数(单位:百件)作为测度指标。

③ 银行存贷比(*LDR*)采用银行总贷款除以银行存款总额测度;存贷比政策放松(*Dum_2015*),2015年及以后年份取值1,反之则取值0。

采取样本截断的办法排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影响,即保留2019年及以前年份的样本进行回归。

数字金融发展。以数字金融发展为典型代表的新兴金融发展会冲击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甚至颠覆银行业的经营。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而言,由于其自身的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且数字化转型进程较为缓慢,因此,可能会遭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强烈冲击,进而引发风险。综上,中小银行的风险可能是地区数字金融发展革新带来的冲击所引致。因此,本文进一步加入测度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的变量(*DFD*)以排除该替代性解释。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中心编制的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测度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指标(*DFD*),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

在排除上述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解释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旧成立,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异质性分析

(1)地区银行竞争度。银行竞争是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异质性银行机构竞争又会影响银行自身的经营行为和战略布局。地区银行竞争加剧会压缩银行的市场份额,且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小银行的传统业务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加速了这类银行的风险暴露。由于竞争导致的利润收窄也可能会促使中小银行涉入更多风险较高的业务,导致其风险进一步上升,因此,从上述视角看,本文预期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推升作用在银行竞争度较高的地区会更加明显。为了验证这种猜想,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用地区银行分支机构占比最大的前三家的平方和(*CR3*)测度地区的银行竞争水平。同时,本文按照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地区银行竞争度高、低两组,并做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Intensity×Post*)的回归系数在银行竞争度较高的地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地区银行竞争水平上升会进一步增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的推升作用。

(2)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地区经济金融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升级,也会影响到地区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对于地区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会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信贷不匹配,以及降低信贷风险(赵家琪等,2023),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基于此视角,本文预期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推升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地方更加明显。本文利用“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来划分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如果城市在当年被纳入试点城市,则在当年及以后年份均纳入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组,反之纳入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组。基于上述的分组,开展分样本回归检验。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如表3第(3)、(4)列所示,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Intensity×Post*)的回归系数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组会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融合应用较好,能够一定程度抵御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的冲击。

(3)银行多元化经营能力。业务多元化是银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也是其对抗外来风险的重要手段(Meslier et al., 2016)。竞争环境变化会导致银行可能面临较为严峻的客户流失、经营恶化和盈利能力降低等问题,进而引发风险。中小银行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强,则能够和竞争对手形成错位竞争,避免遭受更大的风险。因此,本文预期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推升作用在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弱的样本中更加明显。为了验证这种初步猜想,本文采用非利息收入占比测度银行的多元化经营能力。同时,本文按照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多元化经营能力强、弱

表3 异质性分析

	地区银行 竞争度较高	地区银行 竞争度较低	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较好	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较差	多元化经营 能力较强	多元化经营 能力较弱
	(1)	(2)	(3)	(4)	(5)	(6)
	<i>lnRisk</i>	<i>lnRisk</i>	<i>lnRisk</i>	<i>lnRisk</i>	<i>lnRisk</i>	<i>lnRisk</i>
<i>Intensity</i> × <i>Post</i>	0.7847** (0.2932)	0.1863 (1.0908)	0.5353* (0.3012)	1.1734*** (0.4362)	0.2662 (0.3728)	1.5760*** (0.23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446	1451	1235	1653	1348	1338
Adj. R ²	0.7757	0.7996	0.7925	0.7921	0.8061	0.7822

两组,并做分样本回归。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3第(5)、(6)列所示。通过对比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弱组中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会承受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的更大冲击。

五、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相对稳健地从个体银行视角探究了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会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呢?在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的基础之上,本部分从中小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和影子银行业务两个角度展开深入分析。

1. 存贷双重承压

大型银行有更加全面且强大的服务能力,使得这类银行在服务长尾客群和小微企业上具有优势(Berger and Udell, 2006),且其整体经营风险更低、声誉更好、揽储能力更强,会对地方性中小银行存贷端业务形成竞争。因此,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造成地方性中小银行负债端(储蓄)和资产端(贷款)双重承压,推升其风险。从成本的角度看,大型银行加速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叠加其技术转型优势(王鹏, 2024),可能会抢占地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优质客群,导致中小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上升。相比于农商行,城商行自身主要业务和大型银行业务存在更高的同质化与竞争,且其普惠金融业务服务重心下沉不够,难以抵御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的双重竞争威胁和风险。为了能够有效研究这一影响机制,本文分别从存贷数量和负债端成本两个方面研究:采用中小银行的存款增长率(*Deposit_i*)和贷款增长率(*Loan_i*)综合反映中小银行存贷总量层面的变化;采用经过总资产调整后的利息支出(*Inter_{ex}*)反映银行负债端成本变化。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1)一(4)列是存贷数量层面的回归结果,第(5)、(6)列是负债端成本层面的回归结果。第(1)一(4)列结果显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可能导致中小银行存贷两端承压,表现为存贷款增速下滑。从第(5)、(6)列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可能会导致中小银行负债端的成本快速攀升,进而会挤压中小银行的利差空间,推升其风险。

2. 影子银行业务扩张

监管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影响地区银行市场的竞争格局,改变中小银

表 4 存贷双重承压

	存贷数量层面				负债端成本层面	
	(1)	(2)	(3)	(4)	(5)	(6)
	<i>Deposit_i</i>	<i>Deposit_i</i>	<i>Loan_i</i>	<i>Loan_i</i>	<i>Inter_ex</i>	<i>Inter_ex</i>
<i>Intensity</i> × <i>Post</i> × <i>Bank_nature</i>		-1.9747 (1.2321)		-1.7111** (0.8468)		0.0078** (0.0038)
<i>Intensity</i> × <i>Post</i>	-2.7843*** (0.5419)	-1.7000** (0.7629)	-2.3256*** (0.4701)	-1.3561** (0.5734)	-0.0005 (0.0040)	-0.0031 (0.0047)
<i>Post</i> × <i>Bank_nature</i>		0.2141** (0.1051)		0.2402*** (0.0900)		0.0023*** (0.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910	2910	2889	2889	2528	2528
Adj. R ²	0.9102	0.9152	0.8746	0.8841	0.6534	0.6589

行的经营行为和整体的业务拓展策略。大型银行的存贷业务引发的存款竞争压力会迫使中小银行更加依赖影子银行业务 (Acharya et al., 2024)。主要的原因在于：①大型银行带来的存款竞争降低了银行的垄断租金和特许价值 (Repullo, 2004)，进而会激励各类银行开展更多高风险的资产业务和其他创新业务；②大型银行带来的竞争效应会导致中小银行的成本上升，整体的利润空间收窄，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中小银行可能会更多涉入高风险的影子银行业务。但是，中小银行在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上的能力不足，导致其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加速暴露，推升其风险。影子业务扩张又会增加中小银行的脆弱性，提升其风险。对于农商行而言，经营风险较高的业务受到更多限制，由此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可能并不会明显造成农商行过多涉入影子银行业务。因此，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农商行影子银行业务扩张的促进作用可能更为微弱。为了验证可能存在的影子银行业务扩张渠道的影响，本文参照赵旭霞和田国强 (2024) 的

表 5 影子银行业务扩张

	(1)	(2)
	<i>Shadow_bank</i>	<i>Shadow_bank</i>
<i>Intensity</i> × <i>Post</i> × <i>Bank_nature</i>		0.2821** (0.1247)
<i>Intensity</i> × <i>Post</i>	0.2838*** (0.0696)	0.0967 (0.0811)
<i>Post</i> × <i>Bank_nature</i>		-0.0324 (0.0205)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N	1737	1737
Adj. R ²	0.6510	0.6620

研究,引入地方性中小银行影子银行业务的指标(*Shadow_bank*),^①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导致地方性中小银行影子银行业务快速扩张,且城商行影子银行业务扩张更为明显,由此造成其风险上升。

六、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

前文论证了政策推动下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中小银行风险重构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存贷款双重承压、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这两条可能的影响机制分析两者间的影响逻辑。那么,普惠金融政策带来的竞争强化是否有助于推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这种风险处置是否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是本文研究逻辑的有效延展。

1.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区域中小银行合并

中小银行风险防范是金融系统的重要却薄弱环节,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地方性中小银行整体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内部治理制度不健全等,容易造成中小银行的风险爆发。因此,防范地区中小银行风险是当前金融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中国中小银行治理不完善、资产质量差和风险高的问题逐渐凸显,如何有效化解这类银行风险成为中国当前金融经济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银行风险治理的视角看,内部治理和外部竞争都是推动风险治理的重要因素,而银行合并则是化解银行风险的重要手段。中小银行合并能够有效避免经营网点叠加、产品重构和客户重合等过度竞争,有助于优化银行经营、补充资本金和拓宽负债来源渠道,提升银行竞争力。政策推动下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是否能够有效推动地区中小银行合并?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本文引入地区中小银行合并的测度指标(*Bank_MA*),表示当年该地区是否有中小银行合并事件发生。^②为了开展研究,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Bank_MA_{j,t} = \alpha_0 + \beta_1 Intensity_{j,2016} \times Post_t + \gamma Controls + \varphi_j + \mu_t + \varepsilon_{j,t} \quad (3)$$

其中,被解释变量 *Bank_MA* 为当年该地区是否有中小银行合并事件发生的虚拟变量,如果有,取值1,反之则取值0。主要解释变量与前文一致。*Controls*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er_capita*),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测度;城市产业结构(*Ind_struc*),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测度;城市人均工资水平(*Wage*),采用人均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测度;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Internet*),采用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的自然对数测度;固定资产投资(*FA*),采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测度;城市开放程度(*Openness*),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城市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采用地区金融机构年末的存贷款余额之和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城市教育发展水平(*Edu*),采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的自然对数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Pressure*),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差再除以财政收入测度;城市创业活跃度(*Entrepre*),采用地区累计新注册企业数量的增速测度。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地区中小银行合并的回归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可以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有助于推动地区中小银行合并,促进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可能

① 该指标测度为: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应收账款类投资之和除以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作为影子银行的代理变量。

② 本文以银行监管部门对于中小银行合并批示时间作为中小银行合并事件的确认标准。

表 6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中小银行合并与中小企业投融资

	中小银行合并	中小企业投融资	
	(1)	(2)	(3)
	<i>Bank_MA</i>	<i>FC</i>	<i>R&Ds</i>
<i>Intensity</i> × <i>Post</i> × <i>Bank_MA</i>		-0.2686* (0.1509)	1.9294** (0.8237)
<i>Intensity</i> × <i>Post</i>	0.3879** (0.1876)	0.0623 (0.0506)	-0.6404** (0.2947)
<i>Intensity</i> × <i>Bank_MA</i>		0.1184 (0.0837)	-1.9937** (0.8652)
<i>Post</i> × <i>Bank_MA</i>		-0.0442 (0.0290)	0.2664** (0.1201)
<i>Bank_MA</i>		0.0284** (0.0117)	-0.2596** (0.106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973	3755	5887
Adj. R ²	0.0299	0.8475	0.7691

注：第(1)列是城市层面的回归结果，个体固定效应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第(2)、(3)列是企业层面的回归结果，个体固定效应为企业固定效应。

的原因是，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加剧地区银行竞争，由此促进了地区中小银行合并出清和风险治理。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能够推动地区金融资源优化整合，促进“问题银行”合并。

2.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中小银行合并与中小企业投融资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自身的风险累积不仅导致其经营进一步恶化，还会阻碍其支持实体企业(蔡庆丰等, 2024)。推动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有助于实现中小银行新发展，既能够及时防止中小银行风险外溢，还能够优化金融资源再配置。李广子等(2016)研究指出，中小银行健康发展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合并作为“问题银行”风险处置和出清的重要手段，还有助于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因此，本文认为，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推动中小银行合并，提高合并整合后中小银行经营能力、规模效应和风险管理水平，进而可能会促进其对地区中小企业的支持。为了验证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推动地区中小银行合并进而影响中小企业投融资行为，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SMF_{op_{i,j,t}} = \alpha_0 + \beta_1 Intensity_{j,2016} \times Post_t \times Bank_MA_{j,t} + \beta_2 Z_{j,t} + \gamma Controls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j,t} \quad (4)$$

其中， $SMF_{op_{i,j,t}}$ 为 j 地区 i 企业在 t 年的投融资指标，主要包括：企业融资约束 (FC)；参照顾雷雷等(2020)的方法测度的企业研发投入 ($R\&Ds$)，即企业的研发投入(单位：亿元)。 Z 分别为以下的交乘项和单项： $Intensity \times Post$ 、 $Intensity \times Bank_MA$ 、 $Post \times Bank_MA$ 和 $Bank_MA$ 。 $Controls$ 包含企业

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①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的企业样本采用创业板企业数据,样本区间为2010—2021年。相关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参照已有研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类企业样本;②剔除被ST和PT的样本数据;③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④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式(4)探究了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的地区中小银行合并对中小企业融资和研发投资的影响。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中小银行合并与中小企业投融资的回归结果如表6第(2)、(3)列所示。结果发现,第(2)列中交乘项 $Intensity \times Post \times Bank_MA$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引致的地区中小银行合并有助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企业融资的能力,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第(3)列结果显示,交乘项 $Intensity \times Post \times Bank_MA$ 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引致的地区中小银行合并有助于促进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在优化区域金融机构整合的同时有助于推动金融资源配置,进而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融资。

七、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经营网点扩张

在前文的实证中,本文从中小银行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加剧了地方性中小银行面临的业务竞争压力,分流其优质客群,导致资产劣化,推升其经营风险。同时,这种竞争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地区中小银行的合并进程,改变区域金融市场格局。而作为地区信贷来源的另一主体,大型银行凭借其规模优势、稳定的经营状况、数字化转型优势以及更加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持续和稳定的资金供给。这种优势使得大型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那么,大型银行在普惠金融下沉政策的要求下是否会进一步加速其基层经营网点扩张,以便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普惠客群?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LB_exp_{j,t} = \alpha_0 + \beta_1 Intensity_{j,2016} \times Post_t + \gamma Controls + \varphi_j + \mu_t + \varepsilon_{j,t} \quad (5)$$

其中,被解释变量 $LB_exp_{j,t}$ 为大型银行网点扩张的测度指标,分别为 LB_exp1 和 LB_exp2 :前者采用地区当年新增大型银行网点数量(单位:百家)测度,后者采用地区大型银行累计网点数量的增长率测度。强度变量 $Intensity_{j,2016}$ 的定义与前文一致;政策冲击变量为 $Post_t$,如果为2017年及以后年份,取值1,反之则取值0。其中, $Controls$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式(3)的控制变量一致。此外, φ_j 和 μ_t 分别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同时,采用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的样本为城市层面的样本,具体样本的时间区间为2010—2021年。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LB_exp1 和 LB_exp2 。回归结果发现,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监管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

^① 此处的控制变量包含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Size$)、杠杆率(Lev)、独立董事占比($Indeps$)、董事会规模($Boards$)、企业上市年限(Age)、企业现金持有($Cash$)。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er_capia)、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GDP_g)、城市产业结构(Ind_struc)、城市开放程度($Openness$)。

表7 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与经营网点扩张

	(1)	(2)
	<i>LB_exp1</i>	<i>LB_exp2</i>
<i>Intensity</i> × <i>Post</i>	0.7566*** (0.0982)	0.2230*** (0.03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2853	2853
Adj. R ²	0.6588	0.3730

务下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经营网点扩张,能够更好地为地区小微企业和普惠客群提供金融服务。结合表6的回归结果,本文实证研究表明,监管政策推动的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有助于推动区域中小银行合并,进而能够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本部分关于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其经营网点扩张的验证不仅提供了大型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普惠客群的证据,还进一步从侧面验证前文的研究假说。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防范和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领域改革的重点。本文以2010—2021年地方性中小银行为样本,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的竞争格局重塑会推升中小银行风险,且这种风险重构表现为对城商行风险的推升更为明显,且主要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替代性解释和其他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会引致中小银行存贷双重承压、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进而造成其风险上升,且上述效应在目标客群更为接近的城商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在银行竞争更为激烈和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在多元化经营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加速了地区中小银行合并,有助于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地区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此外,政策推动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加速了其网点扩张以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普惠客群。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有如下的政策启示:

(1)要求大型银行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注意防范政策推动带来的银行竞争市场扭曲和中小银行资产劣化。发展普惠金融和防范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两项重要工作,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在通过监管政策要求大型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时注意政策力度和节奏,系统评估政策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可能影响,给地方性中小银行一定的业务调整缓冲期,避免由于其优质普惠客群被大型银行迅速分流带来的资产劣化而引发风险恶化。同时,要鼓励大型银行和地方性中小银行形成错位竞争,杜绝恶性竞争和重复竞争,尤其是要重点关注与大型银行普惠客群更为接近的城商行的风险状况。此外,要持续提升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优化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

处置机制。

(2)加快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数智”模式赋能其运营,降低风险。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小银行冲销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其资产劣化和风险恶化的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中小银行有效拓展普惠客群,寻找新的细分市场,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与协同。为了更好地应对普惠金融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中小银行要积极地运用大数据风控技术,根据客群变化态势调整普惠金融客群的定价策略,使得收益能够覆盖风险以实现普惠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当提升中小银行多元化经营的能力,积极拓展新的产品、客群和盈利空间,提升应对外部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

(3)坚持以市场化风险处置为主导的思路促进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出清,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重点则要关注如何有效化解和处置中小银行风险。本文研究发现,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带来的竞争强化有助于推动地区中小银行合并,以及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出清和处置。因此,要精准识别“问题银行”,遵循市场化风险处置的思路。有序推进“问题型”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坚持“多兼并少破产”,多渠道促进中小银行风险出清和合并重组,充实地方性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提升其持续经营能力。在具体风险处置过程中,应当按照风险成因和风险来源异质性特征进行“精准拆弹”,坚持“早发现、早处置”,用发展的思路处置地区中小银行风险。要以推动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化解为抓手,持续引导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本源。

本文旨在从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视角探究中小银行风险,并进一步探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及其实体经济效应。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拓展:一是尝试从区域差异的角度细化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经济影响,从而丰富相关研究。事实上,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业务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厘清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的异质性影响能够为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经济金融政策提供经验证据,也为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参考。二是当前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后续研究依托大数据采用更丰富的数据样本研究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经济影响,也可以进一步围绕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展开深入分析。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可使用更多维的数据探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风险处置之间的影响机理。后续从上述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政策推动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下沉对银行风险效应的影响,也为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 [1]蔡庆丰,陈熠辉.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J].管理世界,2023,(5):25-40.
- [2]蔡庆丰,吴奇艳,吴冠琛.地方隐性债务、银行风险感知与企业信贷可得性[J].中国工业经济,2024,(1):112-130.
- [3]高昊宇,黄林蕤,王梓静.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承担效应:基于城商行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3,(7):1960-1977.
- [4]顾海峰,于家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J].世界经济,2019,(11):148-171.
- [5]顾雷雷,郭建鸾,王鸿宇.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J].金融研究,2020,(2):109-127.
- [6]郭丽虹,朱柯达.金融科技、银行风险与经营业绩——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21,(7):56-65.
- [7]李广子,熊德华,刘力.中小银行发展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兼析产生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J].金融研究,2016,(12):78-94.
- [8]李双建,田国强.银行竞争与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与实证[J].管理世界,2020,(4):149-168.

- [9]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8.
- [10]刘妍,孙永志,宫长亮,曾刚.LPR机制改革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22,(10):72-84.
- [11]罗荣华,和泽慧,刘劲劲,翟立宏.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市场化演进机制研究——基于修正 Hotelling 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20,(11):133-150.
- [12]田雅群,何广文.互联网金融、市场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2,(3):73-83.
- [13]王鹏.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金融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24,(2):78-96.
- [14]王曙光.普惠金融的制度、技术与组织创新[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5):39-47.
- [15]王修华,刘锦华.大型银行服务重心下沉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行为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3,(8):102-125.
- [16]张小茜,任莉莉,朱佳雪.互联网金融及其监管对传统银行的溢出效应[J].财贸经济,2023,(8):74-90.
- [17]赵家琪,江弘毅,胡诗云,沈艳.数字普惠金融下的小微信贷与风险——基于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视角[J].经济学(季刊),2023,(5):1686-1703.
- [18]赵旭霞,田国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杠杆率监管压力与影子银行[J].经济研究,2024,(2):42-58.
- [19]郑宁,杨小洋,祁敬宇.银行扩张与风险承担水平——基于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视角[J].金融评论,2023,(2):1-24.
- [20] Acharya, V. V., J. Qian, Y. Su, and Z. S. Yang. Fiscal Stimulus, Deposit Competition, and the Rise of Shadow Banking: Evidence from China[J]. *Management Science*, <https://doi.org/10.1287/mnsc.2023.04233>, 2024.
- [21] Allen, F., P. Fulghieri, and H. Mehran. The Value of Bank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Banking Industry[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 24(4): 971-982.
- [22] Berger, A. N., and G. F. Udell. 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ME Financ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6, 30(11): 2945-2966.
- [23] Cornett, M. M., J. J. McNutt, P. E. Strahan, and H. Tehranian.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and Credit Suppl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2, 101(2): 297-312.
- [24] Gennaioli, N.,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A Model of Shadow Banking[J].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68(4): 1331-1363.
- [25] Huang, J., Z. Huang, and X. Shao. The Risk of Implicit Guarantees: Evidence from Shadow Banks in China[J]. *Review of Finance*, 2023, 27(4): 1521-1544.
- [26] Jiang, L., R. Levine, and C. Lin. Does Competition Affect Bank Risk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23, 55: 1043-1076.
- [27] Maudos, J., and J. F. de Guevara. The Cost of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Social Welfare Loss vs. Cost Inefficien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7, 31(7): 2103-2125.
- [28] Meeks, R., B. D. Nelson, and P. Alessandri. Shadow Banks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7, 49(7): 1483-1516.
- [29] Meslier, C., D. P. Morgan, K. Samolyk, and A. Tarazi.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in Bank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 Finance*, 2016, 69: 287-317.
- [30] Repullo, R. Capital Requirements, Market Power, and Risk-taking in Banking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4, 13(2): 156-182.
- [31] Roth, J., P. H. C. Sant'Anna, A. Bilinski, and J. Poe. What's Trending i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 Synthesis of the Recent Econometrics Literatur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3, 235(2): 2218-2244.

Risk Reconstruc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under the Competi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Empirical Findings Based on the Business Penetration of Large Banks

CAI Qing-feng¹, SHU Shao-wen¹, ZOU Jing-xian², HUANG Lei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2.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long with real e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 are among the “three major risks” that China needs to focus on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SMBs) have a deep local presence and posses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erving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clusive finance is one of the key businesses and main profit sources for these banks. To better address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high costs faced by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regulatory policies require large banks to establish inclusive finance departments to accelerate the penetr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2017. However, the penetr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by large banks can lead to the loss of high-quality inclusive customers from local SMBs, resulting in a deterioration of the overall customer bas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hallenging for these banks to raise loan interest rates to cover risks, which can trigger a restructuring of risks for local SMBs.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large banks’ inclusive finance penetration on the risk restructuring of local SMB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uses a sample of Chinese local SMBs from 2010 to 2021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arge banks’ inclusive finance penetration on the risk restructuring of these banks.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ompetitive distortions caused by large banks’ inclusive finance penetration in regional banking markets increase the risks for SMBs, with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city commercial bank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pans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by large banks puts dual pressure on the deposits and loans of SMBs and leads to the expansion of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risks. Heterogeneity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risk-promoting effect of large banks’ inclusive finance penetr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bank competition and weaker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mong SMBs with lower interna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bank risk resolution, the expans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by large banks accelerates the consolidation of regional SMBs, and such consolidation improves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levels of SM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large banks’ inclusive finance penetration on the risk restructuring and internal risk heterogeneity of local SMBs,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risk restructuring in these banks. Additionally, b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the lens of deposit and loan pressures and shadow banking expan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into current efforts to promote risk governance in SMBs. Finally, focusing on a research framework that transitions from individual bank risk promotion to regional bank risk resolu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 diale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isk effects of policy-driven competitive distortions caused by large banks’ inclusive finance penetration. It offer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risk resolution of regional SMBs at the national policy level.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 financial risk

JEL Classification: G31 G21 O38

[责任编辑:崔志新]